



政治·教育·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

Politics Education and Society

● 林家有 著

总序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是广州中山大学“985”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重点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本课题将政治作广义的论述，研究视野拓展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试图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与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以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方，掌握中国的统治权；以广大的爱国、革命的人民大众和追求进步、追赶时代潮流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方。两方代表着中国的两种社会势力，反映近代中国的两种前途，他们的政治理念、思想，以及改革中国的主张制约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近代中国政治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中





心内容和基础背景。现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里,国家的权力中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使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以往中国近现代史在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突破,但是也有不足,比如控制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枢纽——政治变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更迫切研究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研究重心有从社会各面向中心回归的发展趋势和从具体研究向整体把握提高的客观要求。既往的政治史研究,着重于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单向性地解释政治变迁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不安,对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理论的提高。本课题把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为基本切入点,在既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富于创见和有时代特征的宏观阐释系统,以观察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为主导,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和方法的创新,提升研究水平,开辟新的路径。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整体上看,过去的研究兼具成果数量多而缺陷严重的双重特点,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空間仍然较大。我们中山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和优势,在孙中山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前列,讲求学术规范,长期以来形成求实求真的精神和相互协作的学术风气,在多个方面颇具潜力。参与“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课题研究的有老一辈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博士后研究者,其余均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班子,各人就其兴趣和研究所得进行新探索;不少论著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答辩委员的良好评价,经过反复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示人的作品。他们围绕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视野和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各

有特色、各有专长,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性。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丛书,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希望这些成果能对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所帮助与启迪。当然,我们更期望读者和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得知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之后,慨然应允,表示将以最快的速度 and 高质量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我们除了对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外,也对他们为出版学术著作、传播精神文明的精神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钦佩。

林家有

2003年11月于广州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Preface



总
序



目 录

第一编 孙中山建国理念的考察	1
第一章 看清世界,摆正位置	
——孙中山的世界观与全球意识	2
一、为了中国,了解世界	4
二、文明共享,共同发展	13
三、国与国相交,必须平等互惠	21
第二章 独立自主,和平友好	
——孙中山的对外政策与和平理想	31
一、独立的外交思想和平等的对外政策	31
二、为实现“天下为公”和平理想而奋斗	45
第三章 为共和而奋斗	
——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新探	62
一、大中华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内涵	62



二、整合民族意识的目的和意义	81
第四章 为富强而奋斗	
——建设广东“模范省”的主张	96
一、只有政治好,才能有效地进行建设	96
二、只有经济好,国家才会富强	104
三、只有教育发展,强国才有可能	117
第二编 政治与教育	
——近代中国政治对教育的影响	124
第一章 中国传统教育与社会的悖离	127
一、科举制度的危机	127
二、科学制度的废除与近代教育的起始	134
第二章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142
一、辛亥革命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142
二、民初新教育方针的争论	152
三、民初中国教育的发展	159
第三章 变法与变人	
——康有为的人才观和教育改革思想	169
一、为了变法,要求变人	171
二、为了培养变法人才,倡导教育改造	184
三、回归传统,尊孔重儒	187
第四章 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	
——梁启超的“新民”教育观和精神价值	199
一、社会转型对人才的渴求	200



二、教育改造的目的在于树立“新民”的观念	206
三、教育改造“以人为本”	214
第五章 社会变化与近代教育变革	
——严复的国民教育思想	219
一、“鼓民力”——尚武强国思想的发扬	220
二、“开民智”——国民素质的提高	224
三、“新民德”——新伦理道德观的确立	232
四、改学制——学贯中西人才的培养	238
第六章 政治教育与弘扬革命精神	
——孙中山的人才观与教育理念	245
一、孙中山的人才观和兴学主张	247
二、救国与救民	
——从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看他的教育理念	262
三、“博学”与“笃行”	
——从孙中山创建广东大学,看他的育才思想	282
第七章 政党教育与教育独立	
——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	295
一、教育与革命相结合	295
二、领导北京大学而驰名中外	300
三、支持“教育独立”的呼声	307
第八章 “全盘西化”与教育现代化	
——陈序经的文化教育思想	316
一、“全盘西化”思想悖论	316



二、“全盘西化”与教育现代化主张	326
第三编 近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变迁	
——以广东为中心进行考察	336
第一章 18 世纪澳门的特殊地位及其影响	337
一、18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澳门	337
二、澳门优势失落的原因及其影响	343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功利思想与务实精神	354
一、张之洞的功利思想及其影响	354
二、张之洞的务实精神——广东治水	367
第三章 文化与人物	
——广东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的文化因缘	382
一、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关系	382
二、岭南人文环境与文化特征	387
三、广东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的历史原因	395
后 记	401



第七章 政党教育与教育独立

——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①

这是1940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蔡元培先生大会所写的挽联,是对蔡元培一生的总结。

蔡元培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著名的学者,他为我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奋斗了终生,为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一位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起过重要作用、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一、教育与革命相结合

蔡元培(原字鹤卿,后自号子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国学隆盛的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的一个普通商贾之家。蔡元培同胞兄

^①《周恩来同志挽蔡元培先生联》。蔡建国编:《蔡元培画传》,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第四人,姐妹三人,元培在弟兄中居二。他的父亲宝煜为人宽厚,周济朋友,有求必应,借款予人不忍索,家中人以“爱无差等”称之。母亲周氏,贤而能,克勤克俭,抚养诸儿成人,每勉以“自立”、“不倚赖”。元培一生性格安详方正、平易近人,与家教有关。他自述性格上的宽厚得自父亲;不苟取、不妄言,得诸母教。

元培从小尊敬长辈,刻苦好学,又很聪慧。他从6岁起便由塾师授课,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小书,继读“四书”,再读“五经”。11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日贫,抚育儿女的重担都落在母亲周氏一人身上。艰苦的环境、父母的言行在元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勤奋、自强的种子。元培17岁考取了秀才,从此他不再治举子业,专治小学、经书、骈体文,并从叔父铭恩(茗珊)处借来书籍,开始了自由阅读阶段,在阅读《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时,皆得其叔铭恩之悉心指导^①。随着他涉猎的书籍渐广,他的知识也日长,凡关于考据、词章之书,他均随意检读,颇有心得。

1884至1885年间,蔡元培结束了附馆学习的生活,在家中设塾课读,自充塾师,招收6岁以上学生课读,此为元培从事教育工作之始。1886年,元培20岁时,其母逝世,他应邀到同乡徐树兰、幼兰家校书。因徐氏“古越藏书楼”藏书颇丰,他遂得以博览群书,学乃大进。1889年,他参加浙江乡试,中举人;次年,他赴北京会试,又中贡士;1892年春,晋京补行殿试,被录为二甲第34名进士,朝考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他在北京应散馆考试,由庶吉士升初翰林院编修,留京四年。

正当他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彻底暴露,激起了全国人民的

^②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



无比愤慨。蔡元培也深感民族危亡的威胁，曾列名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领衔的奏折，奏请清廷密联英德以御日。当清廷屈从于德俄之强权，不断出卖主权和民族利益时，他又愤怒地指斥清廷“为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其无策之尤也”，表现了蔡元培的爱国心情。他任职翰林院四年，但其间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得以有较多时间读书，殷忧国事，思虑救亡图强。因此，他的思想日趋维新，认为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有所进步，但他对维新党人采取的改良做法却不赞成。1889年，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六君子被杀，更坚定了他的看法。他指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①他深感清廷之不足恃，封建主义犹如人之罹重病，于是他走向办教育之路，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从唤起民众的爱国意识入手，开始了他的教育救国生涯。1898年9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他批评康梁主持的维新运动不彻底。他说：“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②他认为，改革必须培养人才，因此，他提倡新学，传播新思想，立志培养新式人才，引起守旧势力的忌恨，但他不愿妥协，愤而辞职。

离开中西学堂之后，蔡元培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先被聘为绍兴附近嵊县的剡山书院院长，任职一年，因经费困难，校务无从改进，乃辞职。继而又被诸暨县丽泽书院聘为院长，未到任。1901年，他到上海澄衷学堂代理校务。不久，在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继任爱国女校校长。1902年春，元培等在上海发起创立了“中国教育会”，被推选为会长。“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知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③。这是上海一个“表面上办理教

①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新潮社1920年印刊，第5页。

②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14日。

③章元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育,暗中鼓吹革命”^①的团体。蔡元培也由从事教育改革而倡言革命,并逐渐把教育与革命相结合。

1902年夏,他游历日本,同年秋返国,在上海设立爱国学社,被推为总理,提倡民权,宣传革命。1903年冬,参与创办《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他还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密制炸药;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倡议抗法拒俄,先后为《苏报》撰稿鼓吹反清革命。1904年冬,他与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蔡元培在上海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上海分部的主盟员(即会长)。从此蔡元培走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7年6月,蔡元培年已41岁,往德国留学,甘愿做一个老学生。在柏林、莱比锡等城市学习了四年。在莱比锡大学的三年中,他学习范围遍及哲学、心理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民族学等。他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等书,并翻译了《伦理学原理》一书。

以后,他对西方学术文化了解日益深入,成为兼通中西文化的通才,对他此后一生影响深远。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举国兴奋。消息传到德国,蔡元培欢欣鼓舞,“喜而不寐”,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说“革命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已预备很久了”^②。他每天都到同学会去,共同读报,鼓动留学生的革命热情,商量筹款发电报鼓励党人,还致函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建议筹款购买德国克虏伯厂新式的攻城炮。不久,得陈英士电召,即启程回国,12月1日回到上海。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废止尊孔读经,鲜明

①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

②蔡元培:《辛亥革命那一年》。《越风》半月刊,第20期(1936年10月10日出版)。



地反对封建教育制度,推行了中国第一个新的教育制度,树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对民主共和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袁世凯篡权后,唐绍仪以同盟会员身份任内阁总理时,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继续推行教育制度的改革。袁世凯专制独裁,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等革命党人尖锐对立,蔡元培愤而辞职,偕同家属再次赴德国留学。“二次革命”时,他应孙中山电召回国讨袁,失败后,又赴法国继续留学并研究学术,从事翻译。在留法期间,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为中国留法学生做了大量工作。1916年冬回国,1917年初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7至1930年,他前后在北京大学任校长达13年之久,劳绩卓著,影响深远。

蔡元培到北大后,采取了进步的教育方针,他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提倡科学,主张学术自由,培育和支持科学事业。经过调整、充实和卓有成效的改革,北京大学面貌一新,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著名场所。1919年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大学兴起,深得蔡元培的同情和支持。五四运动后,他对中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昂扬精神。他高呼“劳工神圣”,预言“以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①

1927年6月,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逐渐辞去其他职务,改任院长直到逝世,历时13年。

蔡元培晚年,特别是面对日本侵略,他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大声疾呼,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战。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虽在政治上经历过曲折甚至失误,但当他看透国民党的实质以后,就把自己置于国民党的对立面,在保障人权、争取民主自

^①蔡元培:《劳工神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由方面同国民党政权做了力所能及的斗争。

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任副主席，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揭露。“同盟”主持正义，同情中国共产党，营救了许德珩、廖承志、陈赓、罗登贤、余文化、胡也频、丁玲、潘梓年、侯外庐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937年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蔡元培迁居香港。他一边养病，一边主持中央研究院内迁等工作，宣传抗日，被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第二届名誉主席。

由于长期辛劳，蔡元培积劳成疾。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溘然长逝，享年73岁。

蔡元培一生既从政、从教，又从事科学领导工作。然而，他毕竟不是搞政治的人，事实上，终其一生，他都以科学与教育作为事业中的两大支柱。在长中央研究院以前，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上，他领导的北京大学不仅真正成了全国的最高学府，也成了新文化的策源地。蔡元培先从事革命救国，后改为科学救国。然终其一生，他最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倡导和发展。他一生的最大业绩是办教育和从事科学事业的管理、领导。

蔡元培在教育和对科学事业的倡导和建设方面的不朽业绩、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精神，都堪称为楷模。他毕生振兴中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品德，深为全国人民所钦敬，永为人民学习和继承。

二、领导北京大学而驰名中外

蔡元培的第一个重大功绩是他把北京大学办成全国一流的



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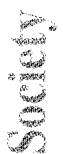
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就任校长,改变了旧中国教育的模式,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京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实行新的教育方针,使中国思想、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生活,都揭开了新的一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学校的主要部分为仕学院,招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入学,另附设招收学生和小学生入学,进士、举人、贡生、监生不及七品,或未登仕版之年在20岁以上者,通称学生;年不满20岁者为小学生。当时入学人数极少,学生不及百人。1912年3月,蔡元培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5月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署理校长,正式有北京大学之名。此后,北京大学迭有改革,但与辛亥革命前相较,北京大学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到蔡元培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仍然是官僚习气十足、陈腐不堪,学生到北大不是为了读书,而是混一个资格,以便进入政界。

蔡元培是抱着牺牲的精神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他不认为办教育是做官,而是实践他的救国理想。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就任之前,他几次在北京发表演说,其中有两次表面上是谈宗教和道德问题,其实是在说明他执掌北京大学的某些宗旨。一是在信教自由会上的演说,蔡元培力斥其时甚嚣尘上的定孔教“为国教之议”,指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孔子、宗教,两不相关。”“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①在任职北大时,他反对尊孔,反对定孔学于一尊,反对定孔教为国

^①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新潮社编辑:《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新潮社1920年印刊,第45~49页。



教。二是在政学会欢迎会演说《我之欧战观》，他认为道德的养成，与宗教毫无关系，而美术的作用则至大，他说：“法、德两国不甚信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有道德心？此即美术之作用。大凡生物之行动，无不由于意志。意志不能离知识与情感而单独进行。凡道德之关系功利者，伴乎知识，特有科学之作用；而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术之作用。美术之作用有两方面：美与高是。美者，都丽之状态；高者，刚大之状态。”^①因此，在北大，他极力提倡美术与美学的教育，就是基于他对人才培养的新认识。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视事。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事：

一是抱定宗旨。他明确宣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劝学生不要抱着做官发财的目的而来北大，要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二是砥砺德行。他指出：“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他要求学生做“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做有道德的高尚人，“品行不可以不谨严”。

三是尊敬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不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②。

这些都是蔡元培对北大学期的期望，也是他改革北京大学的指导思想。

胡适对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改革的气魄衷心敬佩。他认为，蔡先生造成北大最大变化是两个：第一个是组织方面的，即从校长、学长

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②《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页。



独裁制改变为教授治校制。这可以大大鼓励教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加学校基础的稳固性和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第二个是大力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引起青年学生对各种社会活动的浓厚兴趣。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指出的这两点，对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确是至关重要的^①。蔡元培长北大的主要贡献也正在于此。

关于组织方面：

首先是从延揽人才着手，刻意延聘优良师资。

蔡元培到校仅9个月，即聘请了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胡适时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因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的文章，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胡适，蔡氏异其才识，欣然同意决定聘其为北大文科教授。胡适入北大时还不满26岁，得展长才，功成名就，蔡元培于他实有知遇之恩。对此，胡适对蔡元培也终生怀有敬意。胡适在晚年作《口述自传》时，说他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的校长正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②。李大钊于1917年11月应邀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8日，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授予他教授职称，李便兼任经济、史学等系教授。刘半农、周作人等也都陆续应蔡元培之邀约到校任教授。鲁迅则于1920年来校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加上原北大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著名教授，在蔡元培的悉心网罗之下，当时北京大学聚集了一大

^①耿云志：《蔡元培与胡适》。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2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②《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